

必然、可能与矛盾

——乔恩·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解析

曾庆福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

必然、可能与矛盾

——乔恩·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解析

曾庆福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必然、可能与矛盾：乔恩·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解析 / 曾庆福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5. 1(2019. 2 重印)
ISBN 978 - 7 - 215 - 09035 - 4

I. ①必… II. ①曾… III. ①埃尔斯特, J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辩证逻辑 - 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831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55)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 20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前 言

乔恩·埃尔斯特是当代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78年出版的《逻辑与社会》一书,是标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生的奠基性经典著作之一。《逻辑与社会》运用现代逻辑特别是模态逻辑工具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树立了现代逻辑应用研究的一个典范,为现代逻辑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途径和模式。本书试图通过对《逻辑与社会》一书进行深入系统的解析,阐发“逻辑应用”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机理,表明这种研究对于在社会科学中运用逻辑、发挥逻辑的社会功能的重要启迪意义,同时对埃尔斯特的有关观点与论证予以批判性研讨。

本书主要由四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导言”,概述了《逻辑与社会》一书的历史地位和基本内容、国内外有关研究现状,以及本书的结构及所做的主要工作。

第二章“模态逻辑应用的社会视域”,首先概述了现代模态逻辑研究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哲学和其他学科中的应用,评述了埃尔斯特关于模态逻辑在社会科学中之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案例分析,特别是关于“政治可能性”的逻辑分析,系统评述了埃尔斯特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对“必然”和“可能”模态所做的相对化分层,并对其重要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第三章“新型‘现实矛盾’理论的提出”系本书的核心,集中研讨埃尔斯特运用现代模态逻辑所提出的“现实矛盾”思想特别是“社会矛盾”思想,并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本章运用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区分的理论,表明埃尔斯特所刻画的两类“心智矛盾”,即矛盾期望和矛盾信念,实际上仍是人类认知系统中实际存在的“逻辑(自相)矛盾”,并将之推广到解释“逻辑悖论”;而埃尔斯特所着力刻画的两类“社会矛盾”,即反终极性和次优性社会现象,则是“辩证(客观)矛盾”的两种特殊类型。据此肯定了埃尔斯特在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矛盾思想的“分析性重建”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表明其现实矛盾理论的贡献在于厘清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关系”在描述现实矛盾中所起的基础作用,为把握辩证矛盾提供了一种逻辑分析的特殊途径,也为“分析风格的辩证矛盾理论何以可能”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也揭示了其中由于对“辩证矛盾”的褊狭理解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与缺陷。

第四章“‘现实矛盾’理论的应用”,评述了埃尔斯特运用其“现实矛盾”思想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二元理论”,以及他通过社会变迁中集体行动理论探究,系统地运用博弈论工具把握集体行动理论的微观基础,从而开创“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理论脉络,同时也解析了其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缺陷。

本书结语“启示与展望”,表明本书所揭示的《逻辑与社会》一书的成就与问题,既充分体现了现代逻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应用价值,彰显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现代逻辑成果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同时也表明坚持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有机统一,才是分析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逻辑与社会》一书的历史地位	2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概述	2
二、《逻辑与社会》一书的历史地位	15
第二节 埃尔斯特的生平、思想及《逻辑与社会》一书的主要内容	18
一、埃尔斯特的生平和著述	18
二、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	20
三、《逻辑与社会》一书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结构	28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30
一、国外研究概况	30
二、国内研究概况	32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和主要成果	40
一、本书的结构	40
二、本书的主要成果	41
第二章 模态逻辑应用的社会视域	43
第一节 现代模态逻辑研究的兴起及其应用	43

一、现代模态逻辑研究的兴起	43
二、模态逻辑及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应用	51
第二节 社会科学中的可能性推理	54
一、亲属关系系统和结构主义思想案例	56
二、国家实际收入的评估案例	61
第三节 政治可能性	66
一、政治可能性的模型	67
二、量化的政治模态逻辑	69
三、政治可及关系的逻辑属性	75
第四节 “可能”与“必然”的相对化分层	86
一、“可能”的相对化分层	86
二、“必然”的相对化分层	88
第三章 新型“现实矛盾”理论的提出	93
第一节 “现实矛盾”理论提出的背景	93
一、对辩证矛盾理论进行“分析性重建”	93
二、克服对矛盾概念的泛化理解	95
第二节 心智矛盾及其种类	97
一、矛盾期望及其范例	99
二、矛盾信念及其范例	108
第三节 社会矛盾及其种类	123
一、模态合成谬误及其范例	124
二、反终极性及其范例	130
三、次优性及其范例	136
第四节 对埃尔斯特“现实矛盾”理论的评析	140
一、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区别	141
二、“现实矛盾”与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之间的关系	142

三、“现实矛盾”与“可拓逻辑”中的“矛盾”的关系	144
四、“现实矛盾”理论的局限性	147
第四章 “现实矛盾”理论的应用	149
第一节 社会变迁的二元理论	149
一、社会变迁的二元理论的含义	149
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不足	157
第二节 集体行动理论的微观基础	161
一、集体行动的条件	162
二、集体行动何以可能	168
第三节 分析和评价	173
一、意义和价值	173
二、不足和局限	174
结语 启示与展望	179
一、体现了逻辑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价值	179
二、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坚持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 有机统一	181
参考资料	188
后 记	199

第一章

导言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是当代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78年出版的《逻辑与社会》一书,是标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生的奠基性经典著作之一。《逻辑与社会》运用现代逻辑特别是模态逻辑工具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树立了现代逻辑应用研究的一个典范,为现代逻辑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途径和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著作的“逻辑应用”维度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未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与深入开掘,特别是国内学界对这部重要著作的研究极其薄弱,对其“逻辑应用”维度的研究尚属空白。本书试图通过对《逻辑与社会》一书的深入系统的解析,阐发“逻辑应用”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机理,表明这种研究对于在社会科学中运用逻辑、发挥逻辑的社会功能的重要启迪意义,同时对埃尔斯特的有关观点与论证予以批判性研讨。

第一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与《逻辑与社会》一书的历史地位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概述

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当代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埃尔斯特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以其独特的知识背景和厚重的学术基础,运用现代逻辑特别是模态逻辑工具展开逻辑分析,取得了特色鲜明的创造性成果。正如该学派另一创始人G. A. 科恩(Gerald Allan Cohen)所说:

现在谈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通常把三个人称做它的创立者:G. A. 科恩、乔恩·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这种做法不无道理,这里我将遵循这种做法。人们会说,科恩是同前边确定的哲学的方法(指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分析方法——引者)相联系的,罗默是与经济的方法(即建立经济领域数学模型的方法——引者)相联系的,而作为政治科学家的埃尔斯特则是同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相联系的。这种说法大体上不错。但这种说法也有些不准确:因为埃尔斯特对这三种方法的研究最深入最广泛,这三种方法都被应用于他的著作;因为罗默不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博弈理论家;因为科恩的著作也不是一点不涉及以简单的前数学形式出现的博弈理论的那些方法。^①

^① G. A. 科恩.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 段忠桥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3.(译文略有改动)

请注意,这里“方法”一词原文为“technique”,科恩所指的是为分析哲学家所广泛使用的三类分析技术。^①正是运用这三类分析方法或分析技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非常自觉地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分析与当代问题的考察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性分析相结合,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的、富含启发价值的结论。如学界所公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有共同研究纲领和核心信念的经典意义上的“学派”,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种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尊崇共同的研究方法的“思潮”,其共同点正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位创始人罗默(John E. Roemer)所说,就是使用上述分析技术“非教条式地探讨马克思主义”^②,他们不再像苏东型马克思主义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坚持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分析性批判,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逻辑建构及其在当代的解题功能。

科恩的上述评论及对分析方法的分类产生了广泛影响,以至学界更多地把埃尔斯特看作“博弈论—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代

^① 科恩对这三类“分析方法”或“分析技术”做了如下概括:“这里所说的方法在广义上通常被称为‘分析的’,因为对它们的运用要求并且会推进表述的精确与论证的严密。我们可以区分三类这样的技术。第一类是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从二十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最初出现于讲德语的国家,然后(作为纳粹主义的一个后果)在讲英语的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接下来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它们源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但被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赋予了数学形式,后者大体上始于莱昂·瓦尔拉和阿尔弗烈德·马歇尔时代。最后是描述选择、行动和策略的方法,它们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和它一起发展起来,这些方法属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决策论’、‘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些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当代政治科学。”(G. A. 科恩:《2000年版导言: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 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译文略有改动)

^② John E. Roemer. Analytical Marx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2.

表人物,而忽视了科恩本人所强调的这种分类的“失真”之处,即埃尔斯特实际上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全面精通上述三类分析技术的杰出代表,而这一点对于认识埃尔斯特的独特贡献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我们认为,科恩的这个分类所导致的另一个重要的“失真”之处,是遮蔽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两部创始性经典著作的重要差异。

正如罗默在其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在1978年诞生的,其标志是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和埃尔斯特的《逻辑与社会》这两本书的出版。”^①通观这两部经典著作可以看到一个重要差异,即《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主要以日常语言分析方法为主,以逻辑分析方法为辅;而《逻辑与社会》则主要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以日常语言分析为辅。然而,这种差异及其重要性却长期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与深入研讨。

讨论此问题可从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界发生的一场学术争论谈起。当时,我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位主要推动者段忠桥和余文烈之间,曾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不同见解。余文烈坚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结合”、“联姻”、“嫁接”的产物的说法,段忠桥则依据前引科恩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分析方法”三方面的说明及该思潮的研究实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段忠桥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不是特指二十世纪以来流行的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而是泛指包括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内的从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出来的一些研究方

^① John E. Roemer. *The 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 (Vol 1)* [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4:ix.

法。”他认为,上述“结合”等说法只适用于科恩等少数哲学家,而不适用于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就此论证道: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科恩无疑是一个深受分析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他在其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运用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然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它的另一创立者罗默是经济学家,其代表作,如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2年出版的《剥削和阶级的基本理论》(即《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引者),运用的大多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数学分析方法和博弈论,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发现分析哲学的痕迹。它的另一重要人物埃尔斯特是政治学家,其代表作《弄懂马克思》(即《理解马克思》——引者)主要运用的也不是分析哲学的方法,而是理性选择理论。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赖特是社会学家,他运用的主要是社会调查与模型分析的方法;普泽沃斯基是政治学家,他运用更多的是博弈论。总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虽不乏深受分析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但更多的是从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后者显然不是从分析哲学出发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运用的方法显然也不是来自分析哲学,而是来自他们各自的学科。为什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时也被称为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就在于此。^①

^① 段忠桥. 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问题——与余文烈同志商榷[J]. 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4).

笔者认为,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之关系的这种讨论是有意义的。在西方学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中也有关于这种“结合”、“嫁接”、“联姻”的说法,但并未就此展开深入讨论。加拿大学者罗伯特·韦尔(Robert Ware)为他主编的论文集《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所撰写的导言“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分析的”,就是以这种说法为基调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好几种,它们在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甚至研究内容的深浅程度都有所不同”,“并非只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为了把这种说法与“结合”的基调相协调,韦尔只好诉之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表面的共同特征,即严密性和明晰性的追求。“他们中多数人毕竟一直受英语圈哲学的主导传统即所谓分析哲学的影响,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想保持那种严密和明晰的传统。其实,特色鲜明的分析哲学自身现在所留下来的也就是严密和明晰了”,“如果分析哲学还剩下什么的话,那就不是方法,更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强调细节、阐释的明晰性以及论证严密性的风格”,“现在,关注严密性及细节的做法在实践中五花八门,而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理论化和立场都可以依据这一理论化标准予以考虑和评估”。^① 这可以视为对段忠桥上述问题的一种回答,但显然是一种过于表面化的回答。

我们并不反对使用上述“结合”、“联姻”、“嫁接”的说法来把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但笔者认为需要认真讨论上述段忠桥问题并予以深入把握,这对于理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特别是对于理解埃尔斯特的思想是极为关键的。

^①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M].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5,3,3-4,5.

正像段忠桥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潮,其研究成果几乎遍及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领域。但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是一块“整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由哲学上的“联姻”也可推至总体上的“联姻”。考虑到分析哲学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也发生了“应用转向”,即从意义与真理问题的分析为重心转向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法哲学等问题为重心(如罗尔斯《正义论》即被视为分析哲学应用转向的代表作),故“联姻”的说法更顺理成章。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联姻”的说法本身,而在于如何对这种“联姻”的实际机制做出具体分析。

韦尔曾指出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历史方位:“当身处分析哲学传统中的正在探讨‘后分析哲学’或正在研究‘超越分析哲学’的时候,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却乐于谈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①韦尔这里所指出的实际上是指“语言转向”之后形成的分析哲学研究传统范式的衰落。对这个传统研究范式可采用达米特的如下阐释:

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其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和美国以奎因和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卡尔纳普哲学,尽管相互区别很大,却都坚持这些相互交织的准则。^②

①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M].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

② 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M].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

正如达米特所阐释,现在许多分析哲学家已放弃了第二条准则,因而我们可将坚持这两条准则所要求的研究范式的哲学称为“狭义分析哲学”,把只坚持第一条要求的研究范式的哲学称为“广义分析哲学”。也就是说,广义分析哲学注重语言分析方法的“功能”,但并不排斥在对思想的综合说明中与其他研究方法的互补作用。显而易见,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不排斥这种广义的分析哲学研究范式,这正是上述“联姻”论的首要根据。

但是,我们发现,国内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都普遍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在狭义分析哲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以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和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牛津学派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区分:前者认为只有通过使用现代逻辑工具把日常语言整编为克服了日常语言固有缺陷的理想人工语言,揭示被日常语言的表层结构所掩盖的深层逻辑结构,才是哲学研究的正确进路;后者则认为这样的整编必将扭曲日常语言的天然用法,正确的研究进路应当是运用本真态的自然语言来逐步澄清语言的多层面用法,从而澄清用法混乱所造成的哲学混淆。两大学派的长期竞争充分暴露了各自的片面性之后,才在具有实用主义背景的美国分析哲学家的推动下,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了融合。在融合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是:哲学研究终究是一种面向日常语言的事业,但日常语言本身具有难以摆脱的歧义性、隐喻性与可增生性,故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人工语言为载体的逻辑工具在语言分析中的作用,同时对人工语言的理想化成分所带来的失真性保持足够的警惕,推动尽可能逼近自然语言的逻辑工具的锻造。分析哲学的这种发展既推动了各种非经典逻辑研究的蓬勃兴起,也使语言分析的功能发挥领域逐步扩大。正是在这种广泛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分析哲学也逐步摆脱了狭义范式的羁绊。

显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狭义分析哲学两大流派的分野

已经消弭,因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与科恩一样将语言分析与逻辑分析并提,但对这两种方法各自的优劣并没有深刻的体认,多数学者都满足于日常语言分析而很少使用现代逻辑工具进行系统的逻辑分析,更没有去努力把握现代逻辑新工具的发展。就三个创始人而言,科恩由于本身学术背景的限制(其牛津老师赖尔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开创性著作主要运用的是日常语言学派的方法,对现代逻辑工具的运用十分有限(尽管他已不像他的老师们那样予以排斥);罗默堪称数理经济学家,本来把握现代逻辑工具并不困难,他能够最先理解埃尔斯特成就的价值也与此相关,但可惜他一直满足于运用数学建模方法来追求严密性,没有深究其背后的逻辑机理,与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现代认知逻辑的发展在他的视野之外;三个创始人中唯有埃尔斯特既注重自然语言分析,也注重运用现代逻辑工具从事逻辑分析(特别是比较娴熟地掌握了模态逻辑与可能世界语义学,对认知逻辑的最新发展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从而获得了仅运用一个方面的分析方法所难以获得的成就。

但是,埃尔斯特的这种研究风格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是比较孤独的。其中多数学者只对他的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应用感兴趣,他在哲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方面的工作并未得到多少呼应,他们对分析方法的运用更多地仅体现为一种严密性、清晰性的追求,而对以往分析哲学两大流派最重要的遗产——逻辑分析技术和言语行动理论都未能展开深入的哲学与方法论研究。因此,除对埃尔斯特的评论外,段忠桥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哲学兴趣不浓的判断是准确的。

正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这种局面,使得当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未能充分重视埃尔斯特在《逻辑与社会》中已经成型的一些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思想。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小组成员普遍把“辩证法”与“思辨方法”混为一谈,而无视埃尔斯特在《逻辑与社